

出“中国声音”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

3.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 打造精品力作 提高学术影响力。新时代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气派、国际上有影响的一流学科。这绝非一句口号 必须合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史学力作。

4.进一步加强学科队伍建设。新中国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新的专门人才源源不断。迄今,中国近代史学科专门研究人员数十倍于改革开放之前,其素质也极大优化。但从总体上看,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大师,凤毛麟角。所以,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中国近代史学术大家,是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使命。

我们期待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在新时代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小学历史课程暂行标准(1950年8月)[A].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李新.关于近代史分期的建议[J].教学与研究,1956(8/9).

[3]荣孟源.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J].科学通报,1956(8).

[4]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A].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5.

[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长沙:艺文研究会,1938.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李鼎声.中国近代史[M].上海:光明书局,1933.

[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0]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J].历史研究,1954(朱汉国(1954—)男,江苏常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

[11]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J].历史研究,1980(1).

[12]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N].人民日报,1990-10-17.

[13]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4]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N].光明日报,1981-02-17.

[15]胡绳.中国近代史提纲[A].胡绳全书: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6]金冲及先生治学问答[J].史学月刊,2014(5).

[17]胡绳全书:第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8]张海鹏.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J].历史研究,2009(5).

[19]王伟光.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1(1).

[20]瞿林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的发展[J].史学理论研究,2015(1).

[21]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J].求是,1990(22).

[2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3]吴怀祺.内因与外因:柯文“中国中心观”的解析[A].海外中国学评论:第4辑[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4]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25]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J].近代史研究,2012(5).

[26]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J].近代史研究,2012(4).

[27]郑师渠.近代史研究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J].近代史研究,2012(4).

[28]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8.

[29]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9-01-0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缘起、发展与展望

李正华<sup>1,2</sup> 秦颖<sup>2</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崭新的一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不断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①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国史研究,还使国史逐步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国史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有关国史的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学科建设日臻完善,相关档案文献、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传统的其他历史学科相比,国史的学科定位尚须进一步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均需要有新突破。

### 一、国史学科建设的缘起

自1950年代以来,关于新中国历史的编写和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其早期成果可以追溯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以及由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师生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但具有学科意义的国史研究,则起于改革开放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形成,缘于国史研究的发展;而国史研究的发展,则是新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要求。1978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郑重提出“要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并起草了《八年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亲自修改了新的编制报告,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②。胡乔木还请历史学家黎澍牵头,着手进行编写国史的准备工作的。胡乔木对开展国史研究有首倡之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统一思想成为党内外的迫切要求。其时,党内外、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197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作一个讲话,通过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历史作出基本评价。该讲话稿在起草过程中吸收了党内外的意见,于1979年9月下旬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通过。9月29日,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

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恢复中共七大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讲话还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该讲话是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邓小平评价说“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1](P244)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样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进行评价与总结,郑重回答人们所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重大史实,还需要起草出一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表的决议文件。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公开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想法“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2](P69—70)不久,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起草工作,胡乔木具体负责,邓力群分管组织安排联络交流。10月底,中央组织了由20多名理论工作者组成的起草小组,集中开始工作。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拟出一份决议写作提纲,报送邓小平审阅,后经一年多的写作、修改、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于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该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了结论。为了配合决议的学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还编辑出版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以丰富可靠的文献档案材料和经济统计资料,在汲取已

①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术界至今无统一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等概念同时使用。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名之。

②转引自朱佳木《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初创时》(《百年潮》2018年第1期)。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史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对历史决议中所涉及的130条重要史实和理论观点,分条作出详细的注释。决议注释本实际上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史事提要”。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许多重要指导意见,党内外高层干部和学者数千人进行过认真讨论,可以说,制定这一历史决议的过程也是一次国史的集体研究过程。历史决议及其注释本,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文件,也是国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为全面、系统、客观地研究、撰写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提供了基本遵循,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说纪念国庆30周年讲话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正式拉开了国史研究的序幕,那么组织编撰《当代中国》丛书则开始了全国性的国史研究。《当代中国》丛书的编撰始于1980年代初,历时15年,共出版152卷,211册,1亿字,3万幅图片,主要分为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卷和综合卷。该丛书主要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80年代末(有的到1990年代)的历史,系统总结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发展过程及历史经验,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是一部史志结合的、包括专史和地方史在内的科学的信史。1999年6月30日,江泽民在《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上高度评价了《当代中国》丛书的重要价值:“《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sup>[3]</sup>

此外,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对于进一步促进国史研究的发展和国史学科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1990年6月28日,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责是研究、编撰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1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成立,其主要职责是出版当代中国史等方面的图书、音像和电子出版物。1992年12月,全国性的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1994年,国史专业性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创刊。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相继设立了研究当

代中国的机构。自2000年后,当代中国研究所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国史学术年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可以说,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步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轨道,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为国史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 二、国史学科建设的成就

从胡乔木首倡国史研究至今,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国史研究队伍从无到有,初具规模,国史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逐渐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理论与方法等专门史为代表的通史、专史性质的学术成果不断推出,为国史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伴随国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国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逐步形成。概而言之,国史学科的成就主要有三大表现:

其一,机构和队伍建设。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不少地方和部门纷纷成立国史研究相关机构,负责编写地方、部门史,一批原来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研究人员转入国史研究队伍之中。比如,当代中国研究所设立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和港澳台史、理论史六个研究室,成立了“新中国历史经验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史研究中心”、“一国两制史研究中心”、“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非实体中心,并逐步发展为国内外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专业队伍最集中的国史研究“国家队”。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依托当代中国研究所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开始培养国史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当代中国研究所、国史系面向国内外招收国史及其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访问学者。与此同时,一些高等院校也设立了研究当代中国史的机构或中心,并开设国史课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的还面向国外招收留学生。目前,一支遍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的国史研究队伍初具规模,并不断发展壮大,这不仅推动了国史研究的发展,还大大促进了国史学科的建设进程。

其二,资料建设。资料建设是学科建设发展的基础。就目前来看,业已出版的与国史研究相

关的文献资料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重要文件、专题文献选编类。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全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陆续出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以来历次代表大会期间的重要文献选编等。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讲话、文章、报告类。此类多以选集、文集、文稿、年谱、传记等形式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3册,涵盖时限为1949年9月至1976年7月),多侧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所进行的国际国内重大政治活动、所思考的问题和形成的政策与理论观点,历史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的艰难探索,走过的光辉历程。三是大事记、编年、年鉴、百科全书类。此类资料有些收录有原始档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从1949年开始,每年设立一卷,每卷约100万字,已出版了1949—1963年15卷,每卷都收录有部分档案,有的为首次公布。四是兼有研究性的回忆录、口述史料。如吴冷西《忆毛主席》《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等,对国史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五是大型丛书、方志、国情调查类。丛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当代中国》丛书。方志也是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全国地方志事业的开展始于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尤其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成立。30多年来,全国各地完成了两轮修志,有的地方已开始了第三轮修志工作,省、市、县三级志书和乡镇志、村志以及各类年鉴的大量出版,为国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地方资料。此外,各类国情调查更是数量繁多。六是档案文献类。档案文献是国史研究的最重要资料。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7年)》(全21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8—1966年)》(全10卷),为研究1966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提供了系统资料。此外,当代中国研究所从英、美等国家收集了大量的国史档案资料,南开大学、山西大学、邯郸学院等高校收集了大量的地方史档案资料,有的还成

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为国史研究的资料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

其三 学术成果。国史研究的学术成果类别丰富,既有文献资料整理和学术论著,也有音像、影视等转化产品。一是通史类著作。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张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郑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新中国70年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等。二是专门史著作。其中,既有分领域的专题著述,如2016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有分阶段的专门著作,如《1949至1989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三是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如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军事科学院《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后,也出版了一批专题类著作,如《共和国经济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共和国60年文化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新中国国防和军队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新中国宪法发展6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此外,《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等刊物每年都发表大量与国史相关的研究论文。

国史学界在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极为重视相关研究成果的转化。如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当代中国》丛书基础上策划并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有关单位联合摄制了《当代中国》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至今已拍摄完成《当代中国水利事业》等十余部,陆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深受观众好评。《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网站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创办的“国家记忆”栏目,也得到了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总之 经过长期努力 国史研究机构不断发展 研究群体逐渐壮大 资料建设渐成规模 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国史学科建设成绩斐然。

### 三、国史学科建设的发展前景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不断演进 作为中国历史的当代部分 国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作为一门新学科 国史学科也必将随着国史研究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于国史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 近年来更是力度空前。如 2013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中强调指出 “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 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 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 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 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 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sup>[4]</sup> 2019 年 7 月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在《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中再次强调 “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做到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 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这些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 为国史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为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

其一 进一步明晰学科定位和研究边界。

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理论与方法特色鲜明的国史学科 既是学术发展的需要 也是现实的需求。当前 国史学科政治上姓“马” 学术上姓“史”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在指导思想 国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国史工作者应当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反映历史的真实。在研究内容上 国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学科划分上 国史学科的本质是历史学科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 是中国历史的当代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sup>[5]</sup> 国史学科具有历史学科

的一般特点 国史研究适应于历史学科的一切方法 同其他历史学科一样 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 通过收集、整理、考证、分析历史资料 探寻历史规律 总结经验与教训。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还处于成长期 在一些领域还存在明显的研究短板甚至空白点 但充满生机活力。

其二 找准抓手和着力点。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 国史是一门新兴学科 还有很多空白领域需要开拓 比如社会史、环境史、交通史、边疆史、科技史等领域都需要从多视角进行探讨。这些领域研究的不足 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 国史学科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 需要从史料上进行突破。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与其他历史学科相比 国史学科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睹历史本身 因此可以通过对当今社会亲历者的口述来获取更多翔实的资料;同时 新中国成立以来留存的大量音像影像也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国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与内容。可以说 国史研究资料及种类之丰富是一些传统的历史学科所无法企及的 其对于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必将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其次 需要继承和发扬重视研究当代史的传统。重视当代史研究 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董仲舒说 “孔子作《春秋》 上揆之天道 下质诸人情 参之于古 考之于今。”<sup>[6]</sup><sup>[P2515]</sup> 他还把《春秋》记载的 12 个执政者执政的顺序 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个阶段 “有见三世 有闻四世 有传闻五世。……所见六十一年 所闻八十五年 所传闻九十六年。”<sup>[7]</sup><sup>[卷1 P9-10]</sup> “所见世”便是当代史。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起于传说中的黄帝 迄于西汉武帝时的历史 共 130 篇。其中 完全写西汉史的 51 篇 重点或大部分写西汉史的 15 篇 共 66 篇 超过全书篇幅的半数以上。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 《史记》“虽叙三千年事 其间详备者 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sup>[8]</sup><sup>[P138]</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历史的当代部分 距离现实近 研究的意义尤其重大。

再者 需要更加注重人民立场。克罗齐说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sup>[9]</sup><sup>[P2]</sup> 每个史学研究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定阶级、一定政治力量的立场上 这是阶级社会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事实。研究国史,只有始终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自觉抵制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干扰,坚持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的根本学术方法,才能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关系,发挥当代人写当代史的特长,克服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局限;才能把握好国史研究的方向,还原真实的历史,澄清是非曲直,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才能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取得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充分发挥国史研究的存史、资政、育人和护国功能。

其三,走好借鉴和创新之路。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新中国历史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人的极大兴趣。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当代人写不好当代历史”、“研究国史不是学问”等认识上的偏见正在被逐步纠正,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尽管如此,国史在学科理论等基础建设方面仍然存有不足之处,进一步加强国史学科建设工作,必须认真学习传统历史学科的学科建设经验,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建立健全严格的学术规范,促进资源共享,建立国史学科研究体系、逻辑体系,把创建新理论、建立新体系、发现新方法、树立

(李正华(1964—)男,湖南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兼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研究。

秦颖(1975—)女,山东济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生,济宁学院教授,主攻中共党史。)

新范式作为治学的重要目标,充分发挥国史学科应有的学理功能、阐释功能、实践功能。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不断演进,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必将实现大发展、大突破。

####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3]江泽民在会见《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代表时的讲话[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4).
- [4]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2013年3月1日)[N].人民日报,2013-03-03.
- [5]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2019年1月2日)[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103/c1024-30502233.html>.
-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8]刘知幾.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9]贝奈戴托·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孟广林 邹博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谱写了中国当代政治史的新篇章,并开启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构的新历程。回顾70年来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历程,对于厘定学科定位、推动学科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

### 一、从学科“结胎”到学科体系的初创

在历史学领域,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西学东渐”浪潮的促激下,在近代以来知识界对西方学术的借鉴中“结胎”而萌生的。在此之前,受

到外部世界长期的地理隔绝及儒家“华夏中心”说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虽有“天下”观,却无“世界”之概念,对周边地区、国家皆以“外夷”、“番邦”之名鄙称之。鸦片战争后,在日益加深的丧权辱国、“瓜分豆剖”之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筚路蓝缕,前驱先路,开始从外来的西学浪潮中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渐次推进,由此而接触并了解西方世界的历史,亦开启了中国世界史学科之端绪。在这一过程中,继魏源的《四洲

学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它可以帮助一个民族或国家部分地恢复其历史面貌,唤醒其历史记忆。

总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为“通古今之变化”奠定坚实研究基础,以“发思想之

(赵宾福(1963—)男,黑龙江宾县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优秀人才,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汉以前东北考古、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研究。]

先声”作为光荣学术使命。通过发掘和研究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揭示历史规律,通过传承和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把握历史趋势,使考古学真正成为找回记忆、启迪智慧、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人民的事业,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y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aced with the new mission of how to build a Chinese-styl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According to Xiang Yan-nan and Qi Pei-nuo, only the first 17 years after 1949 and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are normal academic stag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Zhu Han-guo think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new era must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team, increase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nstantly have symbolic academic achievements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Li Zheng-hua and Qin Ying think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iginat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As a new discipline, compared with other traditional historical disciplines, the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should be further clarified, and new breakthroughs should be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Meng Guang-lin and Zou Bo think that after upgrading to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world history has not only gained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but also faces enormous challenges of how to further develop. Zhao Bin-fu thinks that the progress of China's Archaeology in the past 70 years is tremendous. The achievements are remarkable and the contributions are multifaceted.

**Key Words:**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y;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rld history; Archaeolog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校对:把增强]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监督电话:010-63094651)。